

# 人口迁移的理论和模式

马 侠

人口迁移研究应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也需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已有的迁移理论学说，有些适用性较广；有些只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经济条件下的若干国家或局部地区的实践总结。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阶段性局部性的经验概括应该加以区别。我们只能吸取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理论原则，并且在分析中国人口迁移的实际情况和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做出新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以推进人口迁移的学术研究。

本文扼要介绍国际学术界关于人口迁移的社会经济宏观理论、人口群体迁移规律，以及人口迁移的经济模式等三方面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学说。

## 一、人口迁移的社会经济宏观考察

近代西方国家的人口迁移，既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必要条件，也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论述原始资本积累、商品生产和流通以及资本输出等经济范畴时，不仅精辟地论述了商品经济诸环节与人口迁移流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人口迁移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历史差异。

### 1. 生产方式与人口迁移

唯物史观揭示，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人作为生产力的首要因素，都需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在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态中，绝大多数人与之结合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人和土地相结合构成的相对稳定性，导致人口的绝少流动和社区之间的封闭性，只是在这种结合遭受严重破坏时，人口被迫离开原地流入他乡，去寻找生产资料进行新的结合。

尽管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有所不同，然而无论是因为人口增殖土地不敷使用，或是由于土地被兼并使自耕农破产，抑或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侵入和瓦解传统农业经济，在上述情况下出现“过剩人口”，都需要另外寻求谋生的天地，人口迁移便因此而成为达到人口与生产资料进行新的结合的必经的途径和条件。

不同的生产方式有不同的迁移形式，由于“过剩人口对于生产力的压力”使古代奴隶制城邦国家“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19页）以便保持城邦之内自由民的稳定生活；而古代东方“一些从事游牧、狩猎和战争的部落，它们的生产方式使部落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有大片的土地……人口增长使他们彼此削弱生产所必需的地盘。因此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欧洲各民族的形成奠定基础的、充满危险的大迁徙”（同上）。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的强迫移民，情况则完全不同。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同上）。

### 2. 雇佣劳动制与人口迁移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英国从新兴的纺织业的国内外市场中取得大

量利润，从而使羊毛需要数量骤增，由此引起世界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新兴的资产阶级和领主把耕地变为牧场，把农民赶出家园。这种强制性的迫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顿时使得大量脱离生产的无业游民到处流浪。为此英王多次颁布法令以酷刑和死刑惩治和威逼那些流浪者，驱使他们进入新兴的工业之中，去与他们完全陌生的生产资料——机器相结合。从此他们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人。正因为劳动力的买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也是商品的交易，自然会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劳动力的价格不仅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而且也必然受供需原则的影响，因此劳动力总是寻找价格高的地方出售，加之新地区的开发或新兴产业部门的创建，资本的多元投向，这一切都会引发地区之间和产业部门之间的人口迁移和流动。

此外，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性的发展，繁荣与衰退交替出现，由此引发的产业部门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增长或削减，也造成劳动力的流动和社会震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发展所引起的人口迁移和流动，称之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同上，第23卷，第534页）。

可见，原始资本积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形成，国内国际市场的发展，生产周期的变换，资本输出的扩展……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每个派生环节都激发起了人口的迁移和流动。

### 3. 现代人口迁移的影响

众所周知，工业化过程曾经历过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某些手工业者，特别是商人虽然是常年不休止地流动，但就社会整体而言，人口的流动性是不大的。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人口，从而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人口流向工业中心又为城市化进程输送了大量机械变动人口，从而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冲击了中世纪社会的狭隘的地方的等级的联合，破坏了宗法或生活的陈旧传统，瓦解了小生产者的分散经营，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生产集中和人口集中，使社会分工得到巨大的推动，把地方性市场汇合为全国性市场，生产者自身也在商品生产和流通中实现了它自身的社会性。“人口流动，大工业中心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生产者性格的深刻变化”（《列宁全集》第3卷，第549页）。“没有居民的流动，居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同上，第279页）。列宁还说：“迁移是防止农民生苔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历史堆积在他们身上的苔藓太多了，不造成人口的流动，就不可能有人口的发展”（同上，第216页）。以上这些论述指明：现代人口迁移不仅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提高人口自身素质的重要因素。

### 4. 人口迁移的历史阶段划分

人口学者扎林斯基（Zlinsky）认为人口迁移和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相关，也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密切联系。他把人口迁移与“人口过渡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人口移动转变论”，从而把人口迁移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1）工业革命前传统社会阶段：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都很高，人口自然增长缓慢，人口很少流动。（2）工业革命早期社会转变阶段：伴随死亡率下降，人口迅速增多，出现大规模由农村面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同时在国内移民拓荒或殖民海外。（3）工业革命晚期社会转变阶段：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抑制人口自然增长，因移民海外使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速度放慢。（4）发达社会阶段：低死亡率和低生育率，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较以前更低，然而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增强，成为突出的特点，而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净迁入人口和因商业活动和旅游的周期性人口迁移增加。（5）

未来超发达社会阶段：推测未来大多数居民迁移是在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对于来自欠发达地区的非技术工人大量迁入，发达地区可能予以控制。<sup>①</sup>

当代发达国家都已经历过前三个阶段，现今正处于第四阶段，而一般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则仅进入第二阶段，即在工业化过程中人口发展状况正经历死亡率降低和人口迅速增多的阶段。因此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特点，应与“工业革命早期社会转变阶段”相一致。正确认识当今中国人口迁移所处的历史阶段，对于研究人口迁移有重要意义。

## 二、人口迁移的规律性研究

### 1. 雷文斯坦 (E.G. Ravenstein) 提出的“人口迁移规律”

19世纪末英国统计学家雷文斯坦是早期对于人口迁移现象进行规律性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使用1871年到1881年英国人口普查资料研究人口迁移。1885年提交英国皇家统计学会一篇题为《人口迁移规律》的论文，用来反驳当时学术界一般认为“人口迁移无规律性可言”的观点。他把英国国内人口迁移归纳为以下六点：

(1) 多数人口迁移都是短距离的迁移。(2) 在一定时期里，有人从某地迁出，遂即有人迁入该地，填补因人口迁出形成的空缺。(3) 每个主要迁移流会造成一个补偿性的反迁移流。(4) 长距离的迁移者通常是迁往大城市。(5) 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迁移倾向略小。(6) 迁移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

其后雷文斯坦又于1889年发表论文，进一步根据20多个国家的统计资料提出七条人口迁移规律：

(1) 迁移者的主体进行的是短距离的迁移。一般的人口迁移所形成的迁移流是流向具有吸引力的巨大工商业中心。(2) 人口迁移在全国范围内呈梯次逐级展开，城市吸收农村人口过程，先是城市附近地区的农民面向城市聚集，由此城市附近农村出现空缺，再由较远农村人口迁来填补，这种连锁影响逐次展开以致波及更远的农村。城市移入人口数量与迁移距离相关，一般是由远而递减。(3) 人口分散过程，正是人口被吸收的反面，二者显示出相似的特征。(4) 每个主要的迁移流会产生一个补偿性的反迁移流。(5) 长距离的迁移者，通常是优先选择迁入巨大的工商业中心。(6) 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迁移数量要少。(7) 女性人口迁移多于男性人口迁移。

雷文斯坦提出的这些迁移规律，概括了迁移距离、迁移流向、迁移者的某些特征等等，这种理论框架是基于地理学研究。迄今百余年，其中若干规律对于许多国家仍然是有效的。然而这些规律是否适合中国情况，还需依靠实际情况和数据资料加以审慎的检验。

### 2. 李 (Everetts · Lee) 等对流量、流向、迁移选择的规律性概括

李于1966年在英国《人口学》杂志发表《人口迁移理论》一文，内容也是对于迁移现象的规律性研究，他的理论概括分为三个部分：

#### (1) 人口迁移量

a. 人口迁移量因地区差别而有所变化。是指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地理自然环境不同的地区里的人口迁移量是不同的。b. 人口迁移量因人口群体差别而有所变化。是指不同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人口群体有不同的迁移量，如青壮年比重大的口群体的迁移量显然会高于青壮年比重小的人口群体。c. 人口迁移量的大小与克服迁移中的中介障碍有关。显然在人口

<sup>①</sup> 扎林斯基，“人口移动转变论”，美国《地理杂志》1971年第61卷，第2期，第219—249页。

迁移过程中的障碍因素的多少和大小及其被解决的程度如何,会直接影响人口迁移量。d.人口迁移量的大小,随着经济的增长或衰退而发生变化。经济繁荣时期人口迁移量较多,经济萧条时期人口迁移量较少。e.除去在强制控制的条件下,一般情况之下,人口迁移量和迁移率总是与日俱增的。f.人口迁移量和迁移率随着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发展状况而发生变化。

### (2) 迁移流和反迁移流

a.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称为迁移流。每一个大的迁移流,必会产生一个反向的迁移流。如有许多人迁出甲地,同时就会有另外许多人迁入甲地。b.如果迁出地对迁移流的影响主要是负因素,那么迁移流的效应(指迁移流与反迁移流的比率)是高的。c.如果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状况近似,那么迁移流和反迁移流的效应趋向是低的。d.中介障碍对迁移流的效应有很大影响。e.迁移流的效应随着经济状况不同而发生变化,经济繁荣时期迁移流效应高,经济衰退时期迁移流效应低。

### (3) 迁移者的特征和选择

李认为人们对于迁移行为的决定是经过审慎比较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各种条件后,做出选择的,这些选择的一般规律性是:

a.对于迁入地的各种正因素,迁移者做出的主要是积极的选择。b.对于迁出地的负因素,迁移者做出的主要是消极的选择,或是负因素正在压倒一切,使人们根本不可能进行选择。c.从迁移者整体来看,他们选择的倾向是双重模式(Bi-Model)。d.正向选择程度随中介障碍减少而增加。e.迁移者在其生命周期的一定阶段中所增强的偏好,对于迁移的选择性有重要的影响。f.迁移者兼具迁出地人口和迁入地人口的二者的中间特征。

### 3. “推力—拉力”理论

雷文斯坦和李对人口迁移的规律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流量、流向、距离、迁移者特征等迁移运动中呈现的客观实际进行理论概括,而唐纳德·博格<sup>①</sup>等人在50年代末提出的“推动—拉力”理论则着眼于迁移原因的研究,即迁出地的消极因素和迁入地的积极因素对于迁移者的影响。他认为迁出地必有种种消极因素所形成的“推力”把当地居民推出原居住地,而迁入地必有种种积极因素所形成的“拉力”把被推出的居民吸引进来。形成“推力”的因素诸如当地的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失业和半失业状况、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等。形成“拉力”的积极因素诸如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好的受教育机会、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等等。当然迁出地对于迁出者也并非完全充满排斥力的消极因素,其中也有一些吸引人的积极因素,诸如家人团聚的欢乐、熟悉的社区环境、在出生和成长地长期形成的社交网络……等等。同样迁入地也并非完全充满有吸引力的积极因素,其中也有一些排斥人的消极因素,诸如单身生活的烦恼、竞争激烈、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等。迁移者总是在迁出和迁入两地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多寡大小的比较中,以及在迁移后的正负效益的利弊得失的权衡之中,做出是否迁移的抉择。

“推力—拉力”学说是根据19世纪工业革命中西方国家出现的商业中心提供的就业机会所形成的吸力,同时农业机械化的进展,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剩,迫使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另谋生活所形成的“推力”而提出的一种迁移理论,自50年代迄今在国际学术界一直十分流行,

<sup>①</sup>唐纳德·博格:“农村发展与城市化”,《国际人口迁移》杂志,1984年第17卷,第1期。

这种学说的理论形态并不深刻，但是用来解释人们迁移的动因是比较形象的。

### 三、人口迁移的经济模式

#### 1. 刘易斯 (W·A·Lewis) 的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式<sup>①</sup>

50年代初，刘易斯提出的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也称为“无限过剩劳动力”发展模型，目的在于论证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为人口流动的一种理论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结构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体系和城市现代化工业体系所组成，称之为二元经济结构。这两种经济体系之间存在着差异。

传统农业部门所使用的有限土地是非再生性的，耕地面积的扩展是极为有限的，生产技术简单而变化缓慢，而人口却持续增加，结果会使经济收益呈现递减的趋势。

这是因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部门是非商品化非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新增加的人口只要到达劳动年龄都会自然就业，进入生产和分配过程，根本用不着计算他们劳动成果实际的边际效益如何，一概依照所谓“共同体原则”共同参加劳动产品分配。相对于土地等资源的过剩劳动力，处于不充分就业或隐蔽性失业状态。在其他生产要素不增加的条件下，他们虽然出工出力，但是并不增加产值，亦即在收益递减规律作用下他们的产值和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增长。这部分过剩劳动力被称之为“零值劳动力人口”。大量“零值劳动力人口”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陷于低水平漩涡的根本原因。

现代工业经济部门使用的是可再生性的生产资料，生产规模和生产速度的扩大和提高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加之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在现代工业部门中的应用，更使其就业人口的边际效益递增以及人口平均收入增加。

传统农业和现代化工业两个部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和收入上的差异，导致工农业两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劳动力转换，从而引起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现代大工业吸净农村中的隐蔽性失业的过剩劳动力，方可使收益递减转变为收益递增，国民经济发展方可由停滞转变为稳定增长，从而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

刘易斯提出的两部门模型对于某些发展中国家是适用的，但是并非适用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 (Schultz·T·W) 指出：关于零值劳动的衡量，不能使用工业部门劳动日长度和天数的计算方法去计算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农业是有季节性的。也不能使用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标准去衡量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的效率，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没有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经济投入，不具备现代农业所显示的效率。因此“零”值劳动力只是一定社会经济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农业里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况且要由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既需要有大量资金和科学技术投入农业，同时还需要有解决安排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这两个条件同样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所缺少的。

刘易斯两部门模式尽管存在如上述的种种缺陷，然而工农业两个生产部门或是城乡两种经济结构性的差异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种见解是有学术价值的理论。

#### 2. 费—拉尼斯模式 (Fei—Ranis Model) <sup>②</sup>

<sup>①</sup> W·A·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第49—95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sup>②</sup> [美] 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劳动力剩余经济的发展》，华夏出版社，1989年。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二人认为刘易斯两部门模式的不足之处是忽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是农业劳动力转入现代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为此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两部门模式基础上，根据农业和工业两部门发展的对应关系把两部门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显性失业人口时，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0”。在图1中，任何超过OD单位的农业过剩劳动力（即DA部分）都是农业过剩劳动力。这时的劳动力供给弹性是无限大的。他们可以由农业部门撤出进入工业部门，不会影响农业生产，而且由于他们的流出，使农业部门形成的剩余农业品，正好成为流入工业部门就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假设农业部门实行制度工资，按最低水平分配农产品）。

第二阶段：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 $MPP_L$ ）升高，ADUV曲线中的DU大于“0”，而仍然低于制度工资（CIW），反映DP部分仍然存在着隐蔽性失业的过剩农业劳动力。所以DP部分劳动力继续流入工业部门，而农业总产量却不能与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同步增长。粮食短缺自然引起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由此工业部门不得不提高工资。费景汉和拉尼斯把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转变点D称之为“粮食短缺点”。

第三阶段：农业部门已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 $MPP_L$ ）逐渐高于制度工资水平（ $UV > CIW$ ），这种现象说明农业部门劳动力收入，不再取决于制度工资，而由农业劳动边际产值决定；也意味着传统农业转化为商业化农业。费景汉和拉尼斯把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变点P，称之为商业化点，由此开始进入稳定增长的发达经济。

费—拉尼斯模式简明地描述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三个阶段，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变的条件。也有些经济学者认为这个模式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模拟的，因而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费—拉尼斯模式是以农业劳动力转换和工业部门增加的就业机会都与工业部门资本积累率成比例为前提的，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往往只需雇佣较前更少的工人甚至可以不必增加工人人数，即可满足因资本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中存在大量的失业者，而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中却又没有太多的过剩劳动力。这个模式提出的若干论点，例如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入工业部门的前提条件等无疑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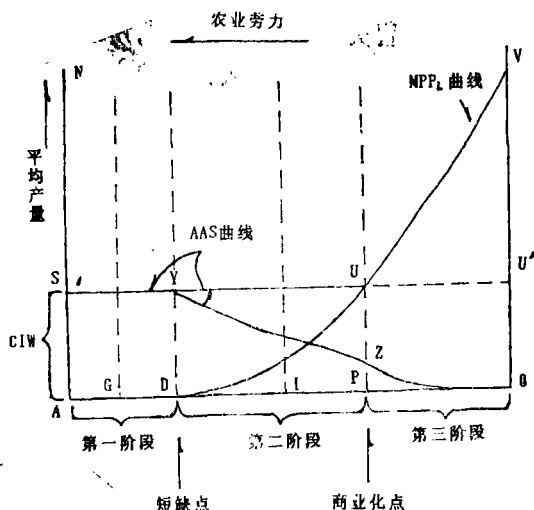


图1 费—拉尼斯人口迁移经济模式示意图

### 3. “投资—效益”模式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 Schultz）在他所著的《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把“直接用于教育保健以及为了取得良好机会而用于国内移民的费用”都看做是“人力资本的直接投资。”<sup>①</sup>也就是说用于迁移的花费和用于受教育的学费同样被看做是能够获得更大利益的投资。斯达科把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和美国经济学家家贝克尔（G. Becker）“成本—效益”理论用于解释迁移的动因，认为人们迁移的花费是

①[美]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现代国外经济论文选》第8辑第232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投资成本,迁移后的所得是效益利润,因此迁移行为的选择取决于迁入地的平均收入是否超过迁出地的平均收入加上用于迁移过程的花费。<sup>①</sup> 迁移者实现的净产值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PV = \left[ \frac{L_j - L_i}{rd_i} \right] - G_{ij}$$

其中:PV表示迁移者实现的净产值,  $L_j - L_i$ 表示迁入地j实际收入与迁出地i实际收入二者之差,  $rd_i$ 表示i地实际收入的折扣率,  $G_{ij}$ 表示从i地到j地所花费的迁移费用。

如果迁移者在迁移后除去折扣率和实际收入值,超过他在迁出地的实际收入与迁移花费之和,他会选择迁移。由此可用以计算预期的迁移人口数。公式如下:

$$M_{ij} = f [PV]$$

其中  $M_{ij}$  表示由i地到j地的迁移人数,  $f$  表示函数, PV表示迁移者实现的净产值。

#### 4. 托达罗劳动力迁移模式<sup>②</sup>

美国发展经济学者迈克尔·P·托达罗 (Todaro·M·P) 针对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到处都是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和城市经济无力为大多数工人提供长期就业机会的现象,试图系统地阐明城乡劳动力迁移的经济行为模式,并把由农村移入人口就业可能性与城市劳动力需求及供给因素的精确模式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后,并非全部立即进入现代工业部门,其就业过程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有技术的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以后首先是在所谓“城市传统部门”找到工作,到一定时期以后,在第二阶段里他们才在现代工业部门中找到固定工作。在这两个阶段里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迁移的决定,城市传统部门的比例规模,加速工业增长以及为进入现代化工业部门就业的可供选择的城乡实际收入差异。他认为农村劳动力移入城市的决定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差异和对于迁移成本和效益的权衡。其中他更强调决定迁移的是城乡之间“预期收入”的差异,而不是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异。譬如,一个农村劳动力一年收入是500元,而一个城市劳动力一年收入是1000元,二者实际收入差别是1000元 - 500元 = 500元,但是如果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机会的概率只有30%,那么他在城市一年的期望收入就只有300元,低于他在农村一年的实际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移入城市显然是不合算的。如果进入城市后就业机会的概率是60%,那么期望收入就是600元,高于他在农村一年的实际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冒失业危险进入城市,所以,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首要因素是城市和农村预期收入的差别。农村迁入城市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率用下列公式表示:

$$\frac{\bar{S}}{S} (t) = F \left[ \frac{y_u (t) - y_R (t)}{y_R (t)} \right] \quad (1)$$

上述公式中  $\bar{S}$  表示农村移入城市的人口数量,  $S$  表示城市原有的人口数量,  $(t)$  表示一定时期,  $y_u (t)$  表示城市过去的平均收入所预期的  $(t)$  期实际收入,  $y_R (t)$  表示农村过去的平均收入所预期的  $(t)$  期实际收入。假设  $\alpha (t)$  为城乡实际收入差别的比率,则:

$$\alpha (t) = \frac{y_y (t) - y_R (t)}{y_R (t)}$$

将  $\alpha (t)$  代入公式 (1) 则得

① [美] 斯达科,“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城市迁移研究”,《世界发展杂志》1982年,第10册,第1期,第63—70页。

② 迈克尔·P·托达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第165—177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frac{\bar{S}}{S}(t) = F[\alpha(t)]$$

显然城乡实际收入差别比率 $\alpha(t)$ 越大,则因农村人口移入城市而引起的城市人口增长率越高。除去城乡期望收入差别以外,影响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另一因素是就业的可能性( $\pi$ ),用下列公式表示:

$$\pi(t) = \frac{\gamma N(t)}{S(t) - N(t)}$$

上述公式中 $\gamma$ 表示现代部门的就业增长率, $N(t)$ 表示 $(t)$ 期内现代部门就业人数。 $S(t)$ 表示 $(t)$ 期内城市人口, $S(t) - N(t)$ 表示 $(t)$ 期内城市人口减去现代部门人口后剩余的城市传统部门人口。

显然就业的可能性 $\pi(t)$ 的数值很小时,尽管城乡期望收入存在一定差别,农村劳动力会认真考虑离开农村迁入城市是否值得,他们会认真对待这种迁移行为的抉择。他们必须在进入城市后在一定时期内承担失业和打零工的风险,并且以此与有利的城乡工资差别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如果就业只有0.5%的机会,那么即使有70%的城市实际工资的补贴对于他们也就没有意义了。

除此而外,在分析城乡劳动力迁移模式时还应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 $\beta$ 考虑在内,因此把前述影响城乡劳动力迁移的几个因素综合起来,“即可得出发展中国家城市劳动力市场纷乱和调节的总模式”:

其简化式为:

$$\frac{\bar{S}}{S}(t) = \alpha + \frac{\gamma N(t)}{S(t) - N(t)} \cdot F\left[\frac{Y_U(t) - Y_R(t)}{Y_R(t)}\right]$$

$$\frac{\bar{S}}{S}(t) = \beta + \pi(t) \cdot F[\alpha(t)]$$

托达罗提出的总模式和刘一费一拉尼斯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刘等以为城乡人口迁移的动因是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别,而托达罗则认为不仅是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别,而且还把“预期收入”的差别与就业可能性以及人口自然增长因素结合在一起,作为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机制。这个迁移总模式是假设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几乎全部人口居住在农村,在城市化进程开始时,新兴的现代工业部门就业机会较多,所以城乡收入差别数值 $\alpha$ 是正值( $\alpha > 0$ ),而且就业增长率 $\gamma$ 超过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 $\gamma > \beta$ ),于是城市预期收入差别导致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尔后逐渐使城市劳动力增长速度超过就业岗位的增长速度,即: $\beta + \pi(t)F(\alpha) > \gamma$ 。于是涌入城市而在现代部门一时没有机会就业的劳动力,只得转入城市传统部门,从而导致城市传统部门规模的扩大,以致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使得下一时期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求职业的概率有所降低,即 $\pi(t+1) < \pi(t)$ 。假如 $\alpha$ 和 $\gamma$ 值保持不变,较低的就业概率会使城市劳动力增长率 $\bar{S}/S$ 逐渐下降。但是 $\pi$ 的均衡函数将依赖 $\alpha$ 、 $\beta$ 和 $\gamma$ 诸值而使失业率稳定在 $1-E$ 的水平上( $E$ 指现代部门雇佣的城市劳动力比例,一般用 $N/S$ 表示)。如果失业率降到 $1-E$ 水平以下时,则以 $\pi$ 值形式出现的均衡力就开始恢复均衡。

托达罗认为采取提高城市现代部门就业增长率 $\gamma$ 的办法去减少失业的政策,而不同时集中力量去降低实际收入差异 $\alpha$ ,是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因此减少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成为潜在的失业大军和缩小城市传统部门规模的最为重要的措施,是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和全力以赴地改善乡村人民生活,否则“尽管成功地寻求现代部门职位的较低概率能够具有长期的稳

定作用，而较高的持久的收入的引诱，也会继续吸引乡村移民的长流进入日益拥挤的城市贫民窟。”<sup>①</sup>显然托达罗揭示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其本原因和诸多影响因素以及城市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对于由农村迁入劳动力的吸收过程的分析更为细致。国际学术界对于托达罗模式褒贬不一，有些学者赞赏这种理论模式，认为它符合发展中国家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实际，也有些学者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头脑之中，入城市以前，并不去计算托达罗提出的预期收入和就业机会概率等等，他们对于城市的信息并不完全了解，他们的迁移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

笔者以为托达罗模式对于中国城乡间人口迁移问题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以后往往首先进入城市传统部门然后进入现代部门就业的观点，以及减少农业劳动力迁入城市的重要措施是缩小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观点，都是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的。

#### 四、结束语

综观上述不同时代的种种人口迁移的理论和模式，其中从唯物史观对人口迁移本质特点，不同社会展现的不同迁移形式，迁移对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自身素质提高的影响，以及人口迁移的历史阶段分期等等理论观点，有的高度抽象概括，有的哲理深厚，其学术价值是人所公认而无庸赘言的。其他各种规律和模式的概括，也有不少理论分析极有参考价值。

然而在研究中国人口迁移问题时，仍然要强调的是务必从中国国情出发，切记上述若干理论提出的背景依据多是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而这些社会经济条件在中国是不具备的。自5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的封闭性被进一步强化，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前，城市政策一直不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以市场经济为主体，劳动力作为市场中的商品可以自由流动。而中国的经济体制在80年代初以前纯属计划产品经济，以后方逐渐向计划商品经济转变。这种经济体制、社会背景差异的存在，要求对于迁移理论和模式的引用，需要有所鉴别和有所修正。如果生搬硬套国外现成的公式和模式，绝难解释中国人口迁移现象，更不必说能够提出恰当的治理决策了。这是研究中国人口迁移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本文通篇坚持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 北京广内印刷厂重要启事

完全由于本厂的疏误，少部分今年第2期《人口与经济》第25—40页错装订了其它杂志的文章，51页图5“城镇蒙古族妇女生育胎次间隔分布图”漏印“古族妇女生育胎次间分布”共11字，其它诸如切口、裁边等也存在一些问题。本厂对出现上述错误深感痛心，并承担全部责任，同时向《人口与经济》编辑部及广大读者、作者表示深切歉意。今后，本厂要严格管理制度，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重大失误。

北京广内印刷厂 1992年6月3日

订阅本刊的读者如发现刊物存在上述错误可与本编辑部联系调换杂志。

《人口与经济》编辑部 1992年6月3日

<sup>①</sup>〔美〕迈克尔·P·托达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集》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7页。